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2.010

论爱德华·汤普森阶级意识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

文吉昌¹, 刘 晓²

(1.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哲文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46; 2.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8)

摘 要: 从书信研究、人物传记、价值批判三个角度对爱德华·汤普森的民族志书写方法进行了研究。对18世纪“粮食骚乱”事件与威廉·莫里斯的生命史的书写, 呈现出爱德华·汤普森对文本中事件、人物以及各种社会关系考察的逻辑和方法。汤普森的民族志研究以英国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为对象, 强调将客观主义叙述逻辑与建构主义叙述逻辑相结合的重要性, 通过将事实深描所呈现的社会现象与价值批判所建构的道德体系相融合, 科学、形象地还原了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以及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缘由。

关键词: 爱德华·汤普森; 工人阶级; 民族志; 书信研究; 人物传记; 价值批判

中图分类号: B56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2-0060-08

引用格式: 文吉昌, 刘 晓. 论爱德华·汤普森阶级意识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2): 60-67.

On the Ethnographic Method in E.P.Thompson's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y

WEN Jichang¹, LIU Xiao²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Nanjing, Nanjing 210046, China;
2. College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Edward Thompson's ethnographic writing methods were studi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letter research, biographies and value criticism. The writing of the "food riots"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 life history of William Morris presented Edward Thompson's logic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events, figures, and various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text. Thompson's ethnographic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and their consciousnes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combining the objective narrative logic with the constructivist narrative logic. Through integrating the social phenomenon presented by deep facts and the moral system constructed by the value criticism, Thompson's ethnographic research has scientifically and vividly restored the growth process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

Keywords: E. P. Thompson; working class; ethnography; study of letters; biography; value criticism

不论在历史学还是社会学中, 民族志都是一种经典的研究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这种方法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前工业时代的非西方社会; 但二战之后, 现代化的普及使世界发展的经

收稿日期: 2018-11-23

作者简介: 文吉昌(1986-), 男, 辽宁大连人,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刘 晓(1988-), 女, 山东潍坊人,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济格局和政治格局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以伦敦、巴黎、柏林为代表的城市文化成为学者们热衷的研究对象,以现代化工业发展为背景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受到了诸如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人的关注。爱德华·汤普森作为英国战后的左派历史学家,其民族志研究关涉了英国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问题。这与经典的民族志理论有所不同,在经典民族志研究中,马林诺夫斯基倡导将“事实”研究作为民族志研究的根本,认为民族志的研究就是“追求事物的客观、科学的观点”^[1]。而在汤普森的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功能具有了价值判断和实践指导的意义。从这一点来看,汤普森的民族志方法与正统的民族志方法产生了认识论上的分歧,也遭到了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批评,“人类学家在民族志方法的使用上批评汤普森没有将客观事实作为该方法运用的唯一前提和唯一目的,认为汤普森的民族志研究增加了太多的主观因素。”^[2]但也有很多学者赞同汤普森在民族志研究中加入价值判断的方法,认为汤普森的民族志研究“是对人的自我认同的一种反应,研究的对象中不仅仅是人还包括抽象的‘社会阶级’,价值判断是民族志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定性的方法”^[3]。笔者认为,单纯从方法使用上来看,汤普森所追求的目标与经典的民族志学者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都在于还原相关群体的真实生活。但汤普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人类学家,他认为民族志方法的使用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即考察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等。不论是研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这两种命题都包含了价值判断的成分,汤普森将强调事实研究的民族志与强调定性研究的阶级意识与资本主义剥削融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不能说汤普森的民族志方法不科学或不正统,而应该说汤普森将民族志的研究与社会价值体系的发展衔接起来,拓宽了民族志方法的使用价值。

一 书信研究

书信研究在汤普森的民族志方法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主要发挥了信息储备和整合的功能。这种书信研究的民族志方法具有两个鲜明的特性,

即历史文本研究的整体性和以小见大、一叶知秋的目的性。汤普森为了使自己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既突出科学性、解释性,又突出自己特有的文学叙述特色,便通过了小说体和人物传记体的方式来呈现18世纪以来英国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的形成过程。如同其它的方法,汤普森在进行书信研究之前已经具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每一个民族志方法的运用都有一定的目的性,都需要解决某些问题,获得某些答案,从而提出某些命题。从这点可以看出,汤普森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与正统的民族志方法(如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有所区别,其民族志研究的基础部分已经加入了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以英国18世纪英格兰地区因食物不足而引发的暴乱为例,汤普森以“粮食骚乱”(food riot)为关键词展开了与以往历史学家结论不同的历史叙述。

18世纪英国的粮食主要指的就是面包,当时史学家们做了统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600万人口中,375万人食用小麦面包,88.8万人食用裸麦面包,73.9万人食用大麦面包,63.3万人食用燕麦面包。”^[4]而且对于普通的工人家庭而言,每月购买面包的开支占当月总收入的70%。对于当时的英国民众来说,最担心的问题莫过于谷物涨价,每年工人阶级家庭都会组织在一起,采取直接的行动,阻止谷物的运输,或者抢夺谷物然后以“公平的价格”(just price)^[5]销售出去,有时甚至直接找到地方政府官员,迫使他们参与谷物的定价和流通。面对这一现象,英国正统的、官方的历史学家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多数历史学家只是简单地将其概括成“暴民造反”运动;而汤普森通过对当时一些学者、工人的书信进行研究,发现了“暴民造反”中的合理性。首先,汤普森列举了官方史学家们书信中对该问题的看法,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著名史学家米罗夫(M. Beloff)在给其学生的信件中提到了这些问题。“这件事情(食物骚乱)是让人愤恨的,那些失业者无法接受上涨的物价而开始攻击谷物商人和磨坊主,让自己堕落到了罪恶的深渊之中。”^[6]汤普森认为在米罗夫的判断中,极端地强调了商人们的“不幸”(distress),过分地渲染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堕落”(degeneration),而忽视了工人阶级在社会底层生活的困苦状态。与此相比

较,汤普森又选取了一封经济学家安士同(T. S. Ashton)写给同事的信。信中安士同认为对这一“粮食骚乱”问题的理解不应从政治立场上来分析,而应该从更加基础的角度来理解,18世纪英格兰的“粮食骚乱”应该被更准确地认定为一种仅凭直觉而引起的反对饥饿的斗争形式(*instinctive reaction of virility to hunger*)。^[7]在18世纪英国“粮食骚乱”问题上,汤普森筛选了大量著名学者和具有代表性工人的书信,这些书信的内容涵盖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生产方式、社会道德等问题。如在经济学家查理·威尔逊(Charles Wilson)的书信中,通过对“粮食骚乱”问题的分析,汤普森总结出18世纪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发展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文化习俗和阶级意识的影响。通过对经济学家罗斯托(W. Rostow)书信中对“粮食骚乱”论述的分析,汤普森总结出英国社会发展中资本积聚的过程,以及资本积聚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生活样貌、斗争形式等。

汤普森在研究18世纪英国“粮食骚乱”问题时为什么会选择将书信作重要文献呢?被选定的书信的作者们在当时官方的报刊上、图书上也发表了很多文章,有过很多著述,为什么汤普森不直截了当地把这些著作拿来作参考文献呢?汤普森并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直白地论述过这一问题,可能是因为这一问题并不是汤普森亟待解决的,也可能这一问题的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关系,汤普森还没来得及处理。但将汤普森所引用的书信与这些书信作者在其他著作中的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书信中关于“粮食骚乱”的论述更加深入,如在查理·史密斯致(Charles Smith)在1760年致英国国会官员的信件中就详细地列举了相关数据。“英格兰与威尔士粗略统计有600万人左右,其中有300万人左右所食用的面包是由小麦制成的,80万人左右食用的面包是黑麦制成的,70万人左右单一地以面包为食,60万人左右会在饮食中加入燕麦。”^[8]从这点来看,很多学者和政治家们的书信中谈论的问题会比较深刻,以调研结果的形式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在相关学者的著作中,“粮食骚乱”现象仅被做了定性的描述,且与当时工人阶级的价值观有所不同。再比如在分析粮食价格问题时,汤普森引用了当时经济学家阿侬(Anon)给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

封信。信中写道:“在1796年,伦敦地区所供给的小麦比上一年减少了25%,但是小麦的价格却比上一年提高了81%,谷物的销售商们1796年所获得的利润高达200万英镑。”^[9]汤普森从这些信件中获得了很多具体的数据,为其民族志研究的开展积累了很多前期准备。在书信研究中,汤普森所做的多数都是个案调查,以个案调查为切入点,汤普森开展了很多的定量研究。个案上的定量研究可以让研究者全方位、深入、细致地了解研究对象。汤普森在论述中提到了亚当斯密关于此次“粮食骚乱”的评价,认为这并不是因为小麦产量下降而引起的工人阶级的暴乱,而纯粹是价格肆意上涨所导致的社会恐慌。汤普森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还发现了亚当斯密没有关注过的领域,即工人阶级中的妇女运动。汤普森在研究中发现当时大量的书信来往中都涉及了妇女上街示威、参与包围谷物商贩等活动,他发现妇女在工人革命斗争中更具有主导性,在法律面前她们从来不害怕,虽然一部分原因在于她们不懂法律,但更多的原因在于女人们的愤怒超过了男人。汤普森认为:“‘粮食骚乱’的倡导者其实是家庭妇女,早在1693年,工人阶级的妇女们就手持镰刀进入谷物交易市场,要求商人们以‘公平价格’出售小麦,在乡下,妇女们又号召男工人去抢夺商人们囤积的粮食,逼迫他们平价售出。妇女在这场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0]

从以上论述来看,汤普森通过书信考察开展了大量的个案研究,获取了很多典型的案例,并从不同的案例中捕获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方法类似于抽样调查的统计学方法,突出了某些文化元素的特殊性和代表性;又类似于一种现象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避开了自己原有历史哲学的逻辑前提,强调人作为社会主体所具有的创造性与独立性。通过这种书信形式的个案研究,汤普森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中对人性考察的方法做了一个综合与提升,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看成是民族志考察的重点。在民族志研究中,书信研究是基础性与前提性的,目的是为日后的田野调查积累信息资源,奠定叙事的逻辑基础。在很多情况下,汤普森的书信研究又具有定量的特点,为了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汤普森在书信研究的个案分析中所采用的民族志

方法更加强调将社会事实作为其研究的最初对象。每种社会事实都有大量的书信文献作支撑, 通过对书信的分析, 汤普森从社会事实中提炼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如通过对书信的分析, 汤普森认为 18 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粮食骚乱”是一次经济与道德的斗争, 工人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中的妇女在阶级斗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并借用了 1766 年一位牧师在其书信中的评价“‘粮食骚乱’本质上就是一场勇敢的、谨慎的、正义的斗争”^[11], 来总结这次运动的历史意义。再比如, 汤普森在讨论 19 世纪末工人阶级组织发展过程时选取大量信件, 其中包括当时工人阶级组织成员写给《经济学家》(*Economist*) 杂志社相关人员的信件, 信中提到了无政府状态的组织形式, “工人阶级如果能够自我发展, 自我提高, 就不需要联合社会中的其他小团体, 其自身就可以形成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资源。”^[12] 汤普森随后对这封信件的内容进行了评述, 认为 19 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正是处于这种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下,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成为了这一时期革命活动的主要精神……无政府主义正在失去它原有的地位, 更多的工人正在联合起来运动。”^[13]

汤普森将书信研究作为其民族志研究的基础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 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 书信是人们交往的常用手段, 与同时代的教材、杂志相比, 书信中所透露出的事件更具有情感因素, 也更切近于事实; 教材与杂志上的内容往往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思想的约束, 很多事件都被赋予了总结性的结论, 但是在书信中, 相同事件往往被描述得更加让人困惑和好奇。汤普森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才决定对书信进行广泛的研究和引用。其次, 汤普森通过书信来研究工人阶级的民风习俗很可能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学的发展有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同其他革命者、理论家之间的书信包含了大量的民族理论问题。有人曾经做过统计,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书信式研究和讨论过程中提及的同时代各界人士有 60 多人, 主要是摩尔根、毛勒、柯瓦列夫斯基、傅立叶、达尔文、梅恩、巴霍芬、麦克伦南、库诺夫、特雷莫等。涉及有关著作近 80 部, 其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直接引用的有近 30

部”^[1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谈到的民族问题涉及宗教、民间文艺、语言、神话艺术等诸多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书信中的民族学理论可能对汤普森产生了重大影响, 汤普森也随着这种书信写作与研究逻辑开展了自己的民族志研究。再次, 从理论的起源上看, 民族学与民族志、人类学的形成有很多相似性, 这些理论在形成的最初阶段, 被研究者们挖掘最多的都是各种民俗资料, 除了一些口头相传的语录外, 研究者们频繁接触的就是书信。因为这些民俗资料在原始阶段并没有形成结构化和体系化的理论知识, 研究者们不可能从书本上获得这些资料信息, 所以说书信成为了民族学理论形成的原始材料。而到了后来, 尽管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逐渐体系化, 但是仍有大量的人类日常生活的细节现象无法被抽象概括成某些概念, 也不能被记载到相关理论著作中, 后来的研究者们只能通过研究书信的方式来捕捉这些具有民族性的社会现象, 并将其提炼出来。可以说, 书信研究是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基础方法, 也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二 人物传记研究

人物传记作为民族志的另一种研究方法也时常被汤普森使用。汤普森曾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整理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传记材料。汤普森研究人物传记的目的不在于研究某个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 而是通过对代表性人物的分析, 呈现出相关社会背景的全貌, 这也是民族志人物传记与普通人物传记在研究模式上的区别。汤普森将莫里斯当作人物传记的书写对象有很多原因, 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在于莫里斯的社会地位、社会影响力以及他的社会经历。莫里斯作为现代设计的开拓者, 将工业制造与艺术设计合二为一, 并在自己道德理论的建构中突出了恩格斯“情感社会主义”的元素。《威廉·莫里斯: 从浪漫主义到革命》一书是汤普森研究莫里斯的成果, 但这本书与其他人物传记有很明显的差别。该书将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当时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紧密联系起来, 呈现了英国 19 世纪工人阶级文化的特点。这就是为何汤普森曾经强调英国共产主义的传统来源于莫里斯和汤姆·奈恩

(Tom Nann)的原因。在研究过程中,汤普森考察了莫里斯时期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活动过程,其中包括了莫里斯的好友巴克(Bax)的事迹。根据莫里斯的回忆,巴克得知1871年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镇压后失声痛哭;之后,巴克一直在为建立公社的理想而奋斗,在研究德国哲学期间,马克思曾经跟他有过很多书信来往,马克思去世后,在恩格斯的帮助下,巴克又进行了更深入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汤普森将莫里斯作为英国知识分子关系的核心,围绕莫里斯描述了巴克、约瑟夫·莱恩(Joseph Lane)、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米歇尔·达维特(Michael Davitt)等十几位在当时具有影响力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出现莫里斯的身影,他们组织在一起形成了英国19世纪末比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

如果说汤普森书信研究的目的是澄清历史事件的事实,那么人物传记的研究则为汤普森澄清了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汤普森通过叙述1882年莫里斯与恩格斯之间通信的内容,拓展并分析了苏格兰劳工组织的建设问题。莫里斯在信中向恩格斯说明:“近几年,英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受到阻碍,很多地下的工人阶级组织逐渐分裂,整个伦敦地区,工人阶级组织的支持者已经不超过400人,而在市中心生活的支持者却不到100人。”^[15]汤普森借助这一事件继续深挖事件背后的社会关系。“支持工人阶级组织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这一原因并不完全来自于伦敦地区,其实在更远处的苏格兰地区,工人阶级理想的宣传仍没有得到重视或是受到阻碍……”^[15]在分析原因时,汤普森又抓住了几个代表性人物,如安德利亚苏伊(Andreas Scheu)、罗伯特·巴恩(Robert Banner)、约翰·玛侬(John Mahon)、亨利·海德门(Henry Hyndman)等。这些人不仅是牛津、剑桥毕业的高材生,他们还是组建苏格兰与英格兰工人阶级组织的主要人物;此外,这些人都与莫里斯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组建英国工人阶级时,这些人彼此之间有着频繁的书信交往。汤普森从莫里斯与他的这些朋友来往的书信中发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理想在1820—1830年期间进入了低迷时期,原因在于海德门在宣传、组织工人阶级活动过程中与其他同事发生了分歧,作为后来社会党

右翼的重要领袖,海德门停止了他的组织工作。汤普森引用了海德门与莫里斯的信件说明这一问题:“近期有很多组织与个人想接管我一手组建的《正义》(Justice)杂志社,这无疑将会使这本传播工人阶级思想的杂志走向毁灭……巴克在这场权力的争夺中显得过于软弱……杂志社里的编辑们都不希望《正义》由其他非工人阶级组织来领导……但苏伊与巴恩在很多观点上与我产生了分歧,现在的工作已经无法开展。”^[15]后来,汤普森在总结这一事件时指出,英国的工人阶级是一个有着阶级意识的群体,虽然社会生产方式不断变化,但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思想”与“阶级意识”在本质上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认为这种具有稳定性的“意识”并不是人人都知晓,工人阶级必须把握住宣传自己的理论武器才能有机会与资产阶级的右翼展开公平的斗争,否则,英国的工人阶级将永远处于劣势的状态。

汤普森在莫里斯人物传记的书写中呈现出一种拓扑型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形象地呈现并有效地解释了19世纪工人阶级运动及阶级意识发展的模式。在《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的传记中,汤普森按照莫里斯的年龄将事件叙述分成多个部分,比如第一部分是莫里斯25岁以前的社会背景。从莫里斯的回忆录中,汤普森总结并抽取了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当作莫里斯成长经历的组成元素,如汤普森在叙述莫里斯出生之前将英国作家拜伦、雪莱、济慈等人的思想总结一番,为研究莫里斯日后诗学的理论做铺垫。在描述中,汤普森讨论了19世纪英国文学特别是工人阶级文学的发展道路以及英国大学文学专业的培养制度与方法。在描述学生时代的莫里斯时,汤普森论述了牛津大学的校园文化,通过莫里斯的信件分析了当时与莫里斯交往甚密的几个有影响力的朋友,如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汤普森在考察中非常注重与莫里斯有过频繁交往的学者和政客们,并且深入地研究这些人的思想特质与理论特点。在分析卡莱尔的文学作品时,汤普森就曾总结,认为从很多方面来看,卡莱尔以工人阶级意识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更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从整体上来看是很有革命性的,但是仍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一种消极

的印象, 这种消极的社会主义辩证思想给莫里斯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莫里斯 25 岁以前的叙述中, 汤普森主要是在莫里斯的关系网中讨论 19 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学革命精神。与第一部分类似, 在莫里斯传记的其他部分, 汤普森讨论并叙述了整个 19 世纪伦敦与周边地区的重大事件, 这些事件的选择不仅与莫里斯的个人成长有关, 还与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发展有关。汤普森考察了英国发展海外市场, 掠夺世界资源的企图与过程, 同时还考察了伦敦地区工人阶级穷困潦倒的生活状态, 还原了底层妇女儿童在沉重的生活负担下挣扎的样貌。在政治方面, 汤普森通过考察莫里斯所参与的政治活动, 叙述了伦敦周边地区警察厅的建设、发展史, 并分析了赫伯特·斯宾塞等人的政治、法律思想。在文学方面, 通过拓展莫里斯的文学叙事方式, 汤普森考察了以雪莱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历史, 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女性革命意识的转变过程。在艺术方面, 通过拓展莫里斯工业品创意设计思想, 汤普森考察了 19 世纪伦敦及周边地区的艺术院校发展、工厂营销策略、珠宝设计创意等内容。在教育方面, 汤普森通过拓展莫里斯在牛津的学习经历, 考察了 19 世纪牛津、剑桥、伦敦等地的教育体制和政府教育基金的配置方式等。在人物传记的书写中, 汤普森一共涉及了 100 多个与莫里斯有过交往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历史学家, 考察了 50 多个社会组织与团体, 涉及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习俗、社会心理。《威廉·莫里斯: 从浪漫主义到革命》中呈现出的拓扑型关系网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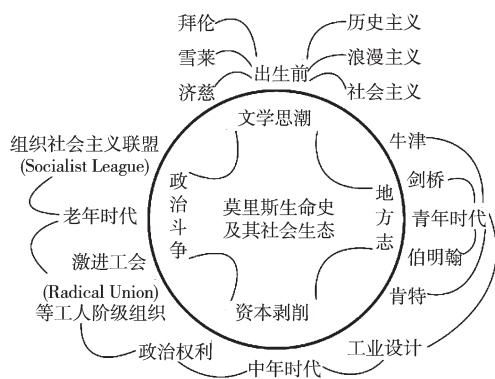


图 1 《威廉·莫里斯: 从浪漫主义到革命》中呈现出的拓扑型关系网

从图 1 可以看出, 汤普森对莫里斯一生的叙述

是多方面、多角度的, 几乎包括了英国 19 世纪的工业发展。在英国工人阶级与阶级意识的形成方面, 通过英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汤普森呈现了 19 世纪伦敦及其周边地区的劳资关系、工人阶级的住宅问题、工人阶级自助与互助问题、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问题以及工人阶级运动中阶级的组织形式与意识特点等。在穷苦大众的日常行为与生活习惯的描述中, 他强调了研究者本人对经济道德、社会发展的忧虑。莫里斯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一个“从浪漫到革命”的副标题, 就是因为汤普森希望通过对莫里斯生命史的描述, 向人们呈现出一种由资本主义发展逻辑转向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不论是书信研究还是人物传记研究, 汤普森都是将这两种方式当作田野调查的前期工作, 通过这两种方式, 汤普森获得了大量的英国工人阶级成长中的经验和数据。通过这两种前期的方法, 汤普森明晰了自己所要描述的场景是与英国工人阶级相关的社会背景, 以家谱分析和个体分析为叙述逻辑呈现了不为人关注的历史现象。在论述中, 汤普森将描述的对象与该对象所关联的文化现象结合起来, 更加生动地从文化人类学高度分析了社会的发展变迁, 这为其后来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三 事实“深描”与价值批判的融合

1955 年出版了莫里斯的人物传记后, 1956 年, 汤普森便离开了英国共产党, 他自己回忆说这是因为苏联入侵匈牙利的缘故。脱党后的汤普森仍然是英国左派的重要理论家, 他呼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批判斯大林集团的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分析历史问题是以汤普森等人为代表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常用的研究方法。他们在讨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时, 趋向于通过文本创作或是文本解读的形式来把握历史事件的价值, “后现代性都是作为意识形态运作的, 而意识形态是利用物质文化和指意系统来进行表达的。”^[16]从 1957 年到 1963 年, 汤普森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进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写作, 该书的写作目的既是为了科学解释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 又是为了批判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汤普森的写作主要运用了民族

志的田野调查方法,他融入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中,与工人们一同劳动,感受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写作的过程中,汤普森不仅运用了以前书信考察和人物传记的研究方法来采集信息,在民族志构建的范式上,汤普森还做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范式的调整使得民族志原有的“深描”特点与社会价值的批判融合在了一起。

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来看,民族志范式的转变首先在于研究对象的属性发生了变化。对于经典的民族志研究来说,研究对象大都是非发达地区生活的种族,如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研究的土著民族;而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所考察的对象是生活在发达都市里的工人阶级。工业时期生活在伦敦的工人阶级与经典民族志中的土著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同社会的发展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伦敦的工人阶级不像土著人那样具有独立性,而是依附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很多时候,他们参与到改变世界发展的活动中。其次,汤普森对工人阶级形成历史的研究不仅在于诉说历史现象,还在于分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就是说,经典的民族志研究者强调通过田野调查来呈现某一种族的发展史,而汤普森则是强调通过田野调查来分析某一群体的精神意识。对历史现象的还原和对特定群体精神意识的考察有着认识论上的区别,前者的本质是对历史的考究,后者的本质是对伦理道德的批判,属于社会价值批判的范畴。因为考察对象的范围及其属性有所不同,汤普森的民族志方法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经典民族志单一“深描”的特点,而是在“深描”的基础上发挥了价值批判的功能。如汤普森在还原英国工人阶级受到剥削的场景时,精心刻画了农业工人、工匠、织工等生活状态。之后,汤普森又进一步从民风、习俗等生活习惯的角度来还原这些工人们的社会关系,从而确保在整体上把握工人阶级的文化现象与文化行为,充分呈现工人阶级意识的结构与功能,精准地反应出特定时期、特定对象的某个特定的片段,这就是汤普森所提供的民族志“深描”。这种“深描”强调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的客观性,是量化的,或者说这种“深描”呈现了一种量化的属性,因为“深描”的结果除了符合客观事实外,所有的数据、材料、

文献都是可以反复计算、分析、再统计的。以往经典的民族志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叙述范式能够符合这种客观主义的逻辑,而汤普森在此“深描”的基础上又开辟了一种建构主义性质的民族志范式。汤普森建构的事实“深描”与社会价值批判相融合的民族志范式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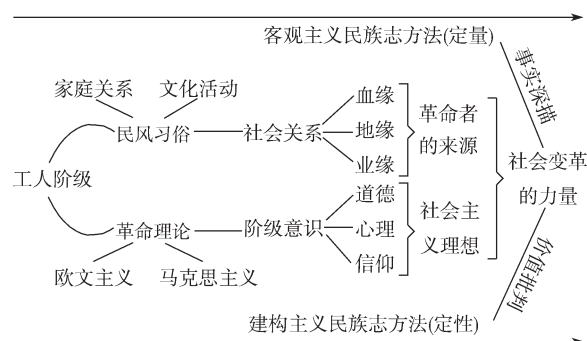


图2 汤普森建构的事实“深描”与社会价值批判相融合的民族志范式

如图2所示,在塑造建构主义民族志方法之前,汤普森先构建了客观主义民族志方法。汤普森将英国工人阶级放在民风习俗的考察场域中,从家庭关系和文化活动等多个视角,分析总结出工人阶级的社会关系结构。这些结构是汤普森从广义上对工人阶级存在事实的界定,包括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诸多方面,汤普森希望从社会关系的考察中将工人阶级界定为社会发展的革命者。此后,汤普森又将工人阶级放置于现有革命理论的场域中进行多方面考察,通过使用欧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各种激进的社会革命理论,汤普森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汤普森从狭义的、个人主义的道德、心理和信仰的角度进行研究,将阶级意识、个人意识、社会意识综合起来考虑,确定了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趋势。在汤普森的民族志理论中,事实的“深描”是一种基础性的、客观主义的、具有定量属性的叙述方法,这种方法也是经典的民族志所常用的方法。汤普森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一种建构主义的民族志方法,让历史经验与革命理论、客观描述与主观判断、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都得到了深层次的融合,从而在综合了事实“深描”与价值批判之后,将工人阶级从社会底层的低级地位提升到社会变革力量的高级地位,使得工人阶级的存在、发展更具有自信和希望。

从整体上来看, 汤普森的民族志研究突出了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研究视域的转移与拓展。同经典民族志研究对象及对象的活动空间相比, 汤普森通过书信研究、人物传记研究、田野调查研究等多种方法, 将研究对象由孤立的土著人转移到了社会关系复杂的伦敦都市市民身上。从这一点来看, 汤普森在二战后开启了一个都市民族志的书写范式。汤普森的都市民族志与经典民族志在研究对象上最突出的区别就在于对研究对象存在意义的考察。与经典民族志相同, 汤普森的都市民族志也是考察社会关系中人的生活状态, 分析每个文化现象发生的背后原因; 但都市化的人比孤立的土著人或偏远山区的群体更加具有社会影响力。以工人阶级为代表, 二战后, 都市化的工人阶级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世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甚至是决定权。由于研究对象的变化, 研究对象包含了复杂的社会关系, 汤普森也将伦理道德特别是经济道德作为呈现都市市民内心世界的切入点, 将人的现实生活、未来发展方向与人的存在意义融合在了一起, 从而催生了汤普森都市民族志的第二个特点, 即价值判断, 或者说价值批判。都市民族志的书写必须包含价值批判这一环节, 虽然经典的民族志研究者们反复强调研究者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评价带入文本的书写中, 以免产生认识上的偏见而影响民族志的客观属性。但汤普森都市民族志的书写考察的社会关系过于复杂, 对于社会关系, 工人阶级的价值评价与价值批判并不来自于汤普森个人的逻辑推导, 更不是来自于汤普森的研究热情, 而是来自于诸如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建构主义等一系列成熟的理论模型与逻辑范式。从历史发展上来看, 这种书写逻辑也顺应了学术潮流的发展, 在当今流行的大卫·哈维都市正义空间的民族志书写和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都市网络空间的民族志书写中都能看到学者们对都市中“资本”“意识形态”“民主”“自由”等概念的批判。对于汤普森而言, 他并没有刻意地将都市民族志的研究理论化、抽象化, 在大量数据的支持下, 汤普森所呈现的仍然是 18 世纪以来英国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最初样态, 其为日后

工人阶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溯源和支持。

参考文献:

- [1] 马林诺夫斯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 梁永佳,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4.
- [2] KAYE Harvey. E. P. Thomp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5.
- [3] RAMPTON Ben. Linguistic Ethn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Identities[J]. Urban Language & Literacies, 2007: 43(9). <https://www.kcl.ac.uk/sspp/departments/education/research/Research-Centres/ldc/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the-pap>.
- [4] STEVENSON John.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England, 1700—1832[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16.
- [5] ELTON G R. England Under the Tudors[J].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225.
- [6] BELOFF M. Public Order and Popular Disturbances, 1660—1714[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75.
- [7] ASHTON T S, SYKES J. The Coal Indust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29: 131.
- [8] SMITH C. Three Tracts on the Corn-Trade and Corn-Law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766: 140.
- [9] SHEFFIELD Lord John. Observations on the Corn Bill[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791: 43.
- [10] ENTWISLE J. Letters from Englan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116.
- [11] THOMPSON E P.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94.
- [12]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790.
- [13] 王小丁.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学书信研究[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0(8): 6.
- [14] DENNIS D.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8.
- [15] THOMPSON E P.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5: 288.
- [16] 李胜清. 文学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3(3): 71.

责任编辑: 徐海燕